



儒家经学思潮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（下）（陈寒鸣）

(2006-4-16 17:53:03)

作者：陈寒鸣

(110) 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八。

(111) 上书卷十一。

(112) 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一《答张敬夫十八》。

(113) 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九。

(114) 上书卷十一。

(115) 《亭林文集》卷三《与施愚山书》。

(116) 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序》（此篇序文又见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六）认为“道统”传授由来已久，并有其经典依据，谓：“其见于经，则‘允执厥中’者，尧之所以授舜也；‘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唯一，允执厥中’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”

(117) 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八、八十三、一〇四、十九。

(118) 上书卷一 一五。

(119) 当然，朱熹并不是只讲“四书”而对“六经”弃之不顾。他以“四书”为经学的基础和主体，认为“‘四子’，‘六经’之阶梯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〇五），要求学者在通“四书”、明义理后，再来研治“六经”。就其本人来说，平生最着力者虽为“四书”，但对“六经”仍亦有所重视，尤对《易》、《诗》用力较多，先后作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学启蒙》、《诗集传》等重要著作。

(120) 《陆九渊集》第405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(121) 上书第395页。

(122) 上书第432页。

(123) 上书第4页。

(124) 上书第455页。

(125) 上书第399页。

(126) 上书第398页。

(127) 参阅陈少明：《六经注我：经学的解释学转折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1993年第8期。

(128) 《阳明全书》卷三《传习录下》。

(129) 上书卷一《传习录上》。

(130) 上书卷三《传习录下》。

(131) 上书卷二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。

(132) 《传习录中》。

(133) 《阳明全书》卷七。

(134) 上书卷三《传习录下·答张敬夫》。

(135) 上书卷一《传习录上》。

(136) 上书卷四《与黄勉之》。

(137) 上书卷五《寄邹谦之》。

(138) 上书卷二《传习录中·答罗整庵少宰书》。

(139) 上书卷三《传习录下》。

(140) 上书卷三十二《年谱》。按：从现有材料看，阳明对《大学》朱熹改本的怀疑，始发生于正德七年（见《传习录上》所载阳明与徐爱的问答），而《年谱》将此系于龙场时（即正德三—一四年间），并认为阳

明此时已信用《大学》古本。《年谱》此说难为信据。

(141) 上书卷二《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》。

(142) 上书卷一《传习录上》。

(143) 陆九渊曾用诗句将自己的观点与朱熹思想的区别表达出来：“易简工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。”（《陆九渊集》卷三十四）其中不难看出对朱学的讥讽之意。而朱熹对陆氏的“简易”亦有非常明确的批评，如据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一五载：“问：‘欲求大本以总括天下万事。’曰：‘江西便有这个议论。须是穷得理多，然后有贯通处。今理会得一分，便得一分受用；理会得二分，便得二分受用。若一以贯之，尽未在。陆子静要尽扫去，从简易。某尝说，且如做饭，也须趁柴理会米，无道理合下便要简易。’”

(144) 黄宗羲：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八《象山学案序》。

(145) 当然，宋末元初以来，就已有儒者基于调停立场论朱陆、辨同异，试图和会理学与心学，开出儒学发展新路。这逐渐成为一股潜生暖长的潮流，吴澄、虞集、赵汭、刘因、宋濂、王祎、苏伯衡等就是其代表者。而明代朱学家程敏政更综结此一潮流而著成《道一编》，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。请详参拙作《程敏政和王阳明的朱、陆观及其历史影响》（载吴光主编《阳明学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）。

(146) 《阳明全书》卷三《传习录下》。

(147) 参阅陈来：《有无之境》第281—283页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。

(148) 程敏政：《篁墩文集》卷二十九《送汪承之序》、卷五十五《答汪金宪书》、卷四十四《复司马通伯宪副书》等。

(149) 《傅山全书》卷四十四《老子解》，第915页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。

(150) 《读通鉴论》卷末《叙论一》。《船山全书》第十册第1175页，岳麓书社1988年版。

(151) 同上卷十七，上书第669页。

(152) 同上卷一，上书第68页。

(153) 《日知录》卷七《饭臭茹草》。

(154) 同上《周氏班爵禄》。

(155) 《四书讲义》卷十一。

(156) 《好古》，载《新世纪》第二十四期，1907年。

(157) 焦循：《雕菰集》卷八《辨学》。

(158) 《松崖文钞·九经古义述首》。

(159) 《戴东原集》卷十《古经解钩沉序》。

(160) 《四书正误》卷四《论语下·阳货》。

(161) 《存学编》卷一《上征君孙仲元先生书》。

(162) 据段玉裁《东原先生年谱》引。

(163)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。

(164) 黑格尔：《哲学史讲演录》第三卷第371页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。

(165)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。

(166) 《戴东原集》卷八《答彭进士允初书》。

(167) 《雕菰集》卷七《翼钱上》。

(168) 上书卷八《愚孝论》、卷七《翼钱下》。

(169) 《擘经室一集》卷二《孝经解》。

(170) 《朱子语类》卷六。

(171) 《太炎文录》卷二《与友人论〈朴学报〉书》。

(172) 王茂、蒋国保等指出：“如果不是与欧洲作牵强的比附、附会，而就中国论中国，即从中国自身思想发展历程来考察，清代原始儒学的复兴，也可以说是一种‘启蒙’，一次‘复古即解放’。因为儒学在其二千年历史发展中，沾染上异学的许多附着物，如玄学、佛学。它们渗入儒学而演为理学和心学，使儒学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而历史事实又证明了理学、心学‘害于心、害于政’，因而激起一些有志于‘正人心’、‘扶世教’的士大夫恢复儒学本来义旨的努力。复兴原始儒学的目的是要使人们从唯心论的蒙昧主义中醒悟过来。从这个意义说，它可以具有‘启蒙’的意义，但不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。”（《清代哲学·绪论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。）是不是历史确实证明了“理学、心学‘害于心、害于政’”？难道宋明诸学不是为了抗衡、剔除“异学”即释老二

氏，并“正人心”、“扶世教”，复兴儒学，才会有道学思潮兴起乃至发展繁盛的吗？能够由于道学中渗入了“异学”因素，或者道学末流弊端丛生而否认这一点吗？晚明清初诸儒返归元典而开掘出许多崭新的思想主张，的称之为“复古即解放”的“启蒙”，但对“以正吾宗而保吾族”为职志的乾嘉诸儒能作出这样的评价吗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均很值得深入探究。不过，尽管笔者并不很认同这种观点，但此说仍有其参考价值，尤其是《清代哲学》一书很有学术意义，故特予以引录，希望诸君能注意到此书及其中的学术观点。

(173) 章太炎《检论·近世商略》谓：“清世寄名理学（按：此‘理学’急括心学在内，实指整个道学）者，无过反复陈言，其去洛闽（按：指程朱）、金谿余姚（按：指陆王）诸哲，固已绝远。”不仅道学本身就存在着太过注重形而上的玄学倾向，而而在道学内部理学与心学数百年的相互改议之中，双方互相揭露和指摘，各自的弱点都已暴露无遗，再经过清初启蒙学者的清算性批判，道学发展至清乾嘉之世尽管仍居官学地位，却确已无生机可言。身为翰林班头的朱筠，只能对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以一句“何于程朱之外，复有论说乎”相攻；理学名儒姚鼐以文章名世，哲理上并无多少可言之处；方东树为回应汉学家对宋学的批评而著《汉学商兑》，条分缕析，颇能指出汉学缺失，但就哲学思想来看，不过维护程朱理学，“反复陈言”而已；如此等等。

(174)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下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第 6 页\]](#)

[\[第 7 页\]](#)

[\[第](#)

[8 页\]](#)

[\[第 9 页\]](#)

[\[第 10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